

## I 浪漫主义——是死是生？

### 1

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浪漫主义就被认为已经死了。法国人将浪漫主义死亡的日期错误地精确到 1843 年维克多·雨果最后一部戏剧问世。其他国家则把这个丧钟敲响的时间定得或早或晚一些，但是对于浪漫主义已死这个事实，人们实在太自以为是了。

与此同时，当人们打开另外一些书，同样著名的书，以及那些政治和文学方面的期刊时，他就会发现浪漫主义仍被看做一种活着的威胁。

“对生活的浪漫主义看法”就是理性、科学和民主的敌人，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从拜伦、卡莱尔、歌德等浪漫主义作家到他们的信徒、尼采和威廉·詹姆斯，都被引用并指责为 20 世纪各种极权主义运动的煽动者。卢梭更是遭到激进的刊物和黑格尔主义者一次又一次地攻击，他们认定是卢梭将德国人民变成了军国主义分子。浪漫主义，虽然已经“作古”并被否定，看起来依然是思想战场上的一支力量。

这样我们从一开始就面临一个明显的矛盾。这个矛盾不会消失，而是随着我们对这个课题的深入而不断深化和扩张。浪漫主义真的死了吗？当我们最为悲痛的（并且试图模仿的）是所谓极权主义在政治上的“现实主义”的时候，极权主义怎么会成为一种“浪漫主义”现象？19 世纪早期德国的那些据推测是充满梦想的浪漫的个人主义者怎么会成

为现代反个人主义立场的创造者？还有更奇特的，浪漫主义哲学家怎么和詹姆斯、尼采成了战友，是谁用生命中大量的时间去和他们斗争的？

这些是留给思想史学家的课题。但是浪漫主义，正如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话题。对现在这个充满社会与文化变革的时代来说，浪漫主义是活着的课题，并且还引发了一定现实问题：浪漫主义对人类的心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吗？还是一种精神失常？如果是精神失常，那它都有哪些病症，我们又该如何应对？一百年前的浪漫主义和现在的浪漫主义之间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如果新浪漫主义从 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敌人，那么我们自己要采取并且捍卫的与之相反的观念或传统又是什么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在一件事上太当然了——那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什么是浪漫主义。“伟大的浪漫主义”或“德国浪漫主义”这样的词被任意使用，就好像每个人都对它们的意义了如指掌，毫无争议。这种印象无疑是从书本上得来的。而事实上，至少有一半的矛盾都是由“浪漫主义”这个词语的滥用引起的。

有人说过，在没有任何准确定义的情况下，想要找到一些词来满足斥责和讥讽的意图实在是太容易了。“浪漫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词。另外那些词也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像“清教徒”、“雅各宾派”、“哥特式”等等。“巴洛克”这个词也是最近才从用于侮辱的词汇中获救，恢复了它描述的功能。试图对“浪漫主义”这个词也来这样一次拯救，这可能既愚莽又不近人情；就像强行取消一个常用词汇的通用含义一样，我们可能无法定义一个词，但是我们使用它时“我们都知道我们指的是什么”。对于这种反对意见的答复是，如果有一个口令让我们分不出敌我的话，我们最好还是把它换掉。

要找出“浪漫”和“浪漫主义”的固有意义的核心，我们必须考虑到众多学科的一些共通之处。对这个问题的探求把我们从政治社会历史带到对于诗歌、艺术和哲学的批评史实；同时也涉及心理学、宗教和共同信仰。对那些人的工作和生活都不熟悉的读者，在刚开始从各种文

本中寻找那些名字时可能会被搞糊涂。确实也没有理由要求一个并不是浪漫主义时代历史专家的人对此懂得更多，不过略知一二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爱好，因此给整个大军命名还是有必要的。我的意图是用历史实例阐释总体结论，并且让这个结论对每个粗通历史的人来说都经得起检验。

出于工作的需要，我也不得不使用一些常用的批评词汇，像是“感性的”、“理性的”或者“现实的”，但我使用时会比其他地方更为精确和克制；我当然会指出每个词我认为必须遵从的意义范畴。如果这些词汇的使用一开始会扰乱它们通常引起的联想，我可以保证，随着文本的不断深入，我要表达的意思也会越来越清晰。

一开头就做出这个警告的原因是，这本书的课题不仅仅是浪漫主义，而是浪漫主义、古典主义和现在所谓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我要讨论的不是众所周知的那个“浪漫主义”——作为文学和情感的一个含糊的轮廓，而是整个浪漫主义时代的意义，它被认为与它的后继者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背景相反。这就是为什么读者在这里找不到对浪漫主义音乐、政见或景观园艺的编年史式记载，而能看到文化历史方面的论文和那些承前启后的评论。这样一来，浪漫主义的面目就不再仅仅是发生在某个国家的诗歌运动。它是发生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特征的欧洲现象。

如果我们想把一个词或概念从它通常所引起的错误联想中解放出来，我们就得从定义它开始。不幸的是，对浪漫主义的定义已经有了一打，并且都无效地保留了下来。理由之一是，仅仅定义是不够的。而同时为了提出复杂的术语，我们又必须为各种正当的用法各自找到一个清晰的概念。因为过去有许多不同的东西都被称做浪漫主义，一些学者认为无法给出浪漫主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或者他们认为浪漫主义根本不能代表任何清晰切实的东西。这一点被头脑不清的人用来解释为，如果一个词不能表达一个东西，并且只表达这一个东西，它就可以表达任何东西，或者什么意义也没有。我们每天的对话就推翻这一点，一个具体的词“chair”可以指一件家具，一个教授的职位，或

是会议的主持者；只有通过上下文才能避免歧义。一个抽象的词，像“American”可能是北美洲、美国、三个美洲 以及在其中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想像到的一切，从土著印第安人到一种形式的英语；当然，这里仍然是上下文避免了混淆。

现在“浪漫”的使用有两块不同领域。一种意义上它是人类的天性，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展示出来。另外一种意义上，它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冠名，那个时期的特征是由几个著名人物赋予的。这两种认识显然是有关系的。一个时期被赋予特征无非是因为那时人们的主要倾向如此。浪漫主义者 清教徒 理性主义者 虔信派教徒 他们并不是独立的生物种类，而是人类品种的不断重现，因为各自基于自身态度而建立起的相对的价值观而有所区分。但是这些以主要特征为区分的派别并不排除其他人的存在。理性主义者并不是惟一有理性的人，清教徒和虔信教徒也不是没有理性——理性主义者的理性也不比浪漫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更多。我们把 18 世纪称做理性的时代，只是说那个时代人们讲了许多有关理性的事，并且希望有意识地使用理性能够给人类生活带来显著的进步。只有愚顽不化抠字眼的人才会猜测这个名称意义是指 18 世纪对理性有专利权，并且在此之前和之后，人们都不讲理或是不可理喻的。

对“浪漫”这个词来说，正是这种类型的错误暗示妨碍了这个词的表达功能。几乎没有说着这个词和写着这个词的人停下来搞清它的适用性，看看他们选择的这个名称之下还有多少其他内容。例如，一种对拜伦的耳熟能详的批评。这里有一种浪漫主义，据说赞美了人的能量与大自然狂野力量之间的亲缘关系。这种浪漫主义使野蛮的激情合法化；这正是无法无天的暴君的情绪。如果出于争辩的原因接受这种见解，那么接下来的疑问就是，对于整个浪漫主义来说这种见解能证明些什么？比如我们提到其他完全有权利享受“浪漫主义”头衔的诗人——华兹华斯或者普希金。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用希特勒的标准来给他们的观点上纲上线？“伟大的浪漫主义”在别的艺术门类——绘画 音乐 舞蹈等等——中的表现又是如何？它们是否也是极权主义的萌芽？我们

越是把这种观点放大，想要看清这种观点要表达的两者的关系就越困难。济慈的《夜莺颂》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戈雅的铜版画《西班牙解放战争》和现代独裁者对这块半岛的剥削又有什么必然联系？

通常，回避困难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办法是从众多“浪漫主义者”中挑出所谓最“彻底”最“本质”的浪漫主义代表来——如挑出拜伦的章节，而对济慈、华兹华斯、雪莱、柯勒律治等等上百号人统统视而不见。因为在任何整体中总有意外。还有一种从本质上没什么区别的说法，即只有德国的浪漫主义者要为新的无法制状态负责。那么，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其他国家的独裁者没有德国传统的帮助是怎样达成他们的统治的？再追究下去，德国浪漫主义和法国、英国、西班牙的浪漫主义究竟有什么不同？这种不同之处，如果有的话，它一定就是罪恶的根源，而与浪漫主义本身没有关系。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承认这个观点，即人类社会令人反感的发展是历史上的浪漫主义的新表现，我们就必须能够证明那些生活在一百二十五年前的大部分伟大人物都鼓吹或致力于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必须证明歌德、拜伦、康德、席勒(Schiller)、卡莱尔、爱默森、贝多芬、密茨凯维支(Mickiewicz)、布莱克、德拉克洛瓦、雪莱、叔本华(Schopenhauer)、海涅、柏辽兹、普希金、司考特、大小仲马、曼佐尼(Manzoni)、肖邦、兰姆、赫兹里特(Hazlitt)、梭罗，还有约一百个19世纪早期的代表人物，都是极权主义的先锋或受益者或者其他什么不受欢迎的身份。我们可以容忍在一个定义的全体里有个别例外，但例外的数量显然不能超过能证明这个定义的数量。

逃脱僵局的第二个办法是声称军国主义的根基并不显露于浪漫主义表达出来的观点和外在形式之中。那是一条深藏不露的灵魂，贯穿整个浪漫主义事业之中——无论是诗歌还是政治理论。据此推论，华兹华斯对自然的热爱和德拉克洛瓦对分割色块的热爱，同样有害于未来的民主。同样道理，开放的拜伦和保守的司考特爵士在为独裁统治做准备的道路上可是同党。在他们身体里有一些隐秘而强大的萌芽，

日后将注定发展成迫害和军国主义。

第二种分析并不比第一种高明。它把太多东西归于抽象，不管是谈到浪漫主义还是把现代社会的转型贬低为对武力和征服的宣传时都是如此。事实上，在这种对比中，对大量史实最浅薄的认识导致了这个轻率的推论。但是在从历史角度和现实角度检验浪漫主义之前，我们必须再一次认识到，在对浪漫主义和治安状况之间关系的假设中，这种观点的态度是多么暧昧不清。

如果有人查寻一下公认的关于浪漫主义的信息，他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是，以个人主义为最显著特征。浪漫主义十分重视个人。对有些人来说，它甚至夸大了个人的价值和力量。在这里我不想争论它是否正确。关于这点已有定论。现在我要问的是，大规模的暴政是如何表达了浪漫主义的？为何无论在极“左”还是极右的文学作品里我们都能找到对个人主义的谴责，把它看成一股分裂的力量？那么在今天你是否还能找到浪漫主义的个体——叛逆，古怪，自我中心，我们只要一想起历史上的浪漫主义就会立即想起他们？如果浪漫主义重视个人的价值，那么我们必须为头脑简单的人群找到另外的理论，并且制造一个压抑、集团化、被严格制约的民族。

## 2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彻底糊涂了，因为，浪漫主义和今天的政治之间毫无疑问是有关系的。我刻意再造了那些现存的混乱，是为了打破存在于浪漫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之间表层和内在的联想，人们对这些片面而顽固的联想已经习以为常。无论是 19 世纪的那些才子还是他们伪装之下的什么东西都不应该为我们这个糟糕的世界负直接的责任。浪漫主义和现代集体主义之间联系的问题我留到以后再谈。我们现在从这种联系源头上的问题开始：谁是浪漫主义者？是什么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共享这个总称？

在英语中，“浪漫主义”这个词由两个形容词组成——浪漫的和浪

漫主义者的。它们一般不被区分，但是事实上它们应该被区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我已经开始分辨的两个不同的应用领域区别开来：作为历史运动的浪漫主义和作为人类性格的浪漫主义。然后我们会说“我的某个朋友是浪漫的”和“诗人拜伦是个浪漫主义者”。通常我们说到“浪漫主义者”时，我们应该指的是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生活的一些人，他们做的某些事将他们铭刻于后代的记忆中。虽然他们在观念上互不相同，并且斗争激烈，拜伦、华兹华斯、雪莱、维克多·雨果、莱奥帕尔迪、密茨凯维支、席勒，他们都是浪漫主义者。不管他们自己是否喜欢，他们都得到了这个称呼。事实上，有许多浪漫主义者极力想摆脱这个头衔，如德拉克洛瓦；或者只承认其作品中的一半是浪漫主义的，比如歌德。从这个角度看，浪漫主义只是一个标签，而不是一种充分的描述。你从一个人的浪漫主义者头衔中无法推断他的性格，更无法了解他的观点。你能够推断的，都是我们容易看到的表象。同时想一想浪漫主义者是一条与“文艺复兴运动者”相平行的术语。如果有人与活着的里昂纳多·达芬奇谈话并且问他：“你是一个典型的文艺复兴运动者吗？”他一定会说：“你在胡扯什么啊？”虽然，在关于那个时期的所有概论中都有这个名字——里昂纳多“时代的代表”同时也有与他完全不同的米开朗琪罗——他的对手，但同样有代表性。他们被捉进年表的蛛网中，历史的编纂为他们贴上了最便利的标签。

就浪漫主义而言，这个问题更为复杂是因为在浪漫主义时期有一小撮作家和思想家挪用了这个总称。举个例子，在德国，学者们把浪漫主义分为前期与后期，但无论在哪一部分你都找不到席勒和歌德。他们被排除在外，虽然歌德的《浮士德》是浪漫主义的圣经。如果你想查找另一个德国的浪漫主义者海涅，就必须到“青年德意志”里去找。这就是人文历史的卑鄙伎俩。法国浪漫主义也是一样，你可以在对立的两派中同时找到雨果和司汤达（Stendhal），它们各自代表了文学政策中不同的阴暗。在英国，没有人在世时被称为浪漫主义者。这完全出于传记作家或几门艺术的历史学家的兴趣。然而为了模糊时代的轮廓而去使用这些临时性的差别，就是通过卖弄学问而进行的蒙昧主义犯

罪。只有当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对浪漫主义有一个真实的总体概念时，才有可能对其细节提炼和升华。根据我们现在的想法，历史上的浪漫主义可被界定为由生于 1770 年到 1815 年之间在 19 世纪上半叶的哲学、国家管理及各类文科上取得声望的欧洲人组成。

当然有些人的生辰不在这个武断的限定之内，比如歌德。还有一些人取得声威的日期有所推迟，像布莱克。还有一些人拒绝被划分在这个主体之内。但是这些异端的数量毕竟太少，不会影响人们将浪漫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派别来看待的看法。历史并不把它的产品打成捆出售；是人类极力要为混乱的历史制订规则。因此就算是粗糙模糊的边缘，也必须是某个明确纯粹的中心的边缘。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群生活于 1770 年到 1850 年之间被称做浪漫主义者的人。那么，除了时间之外，是什么把他们联系于一体的呢？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从历史的浪漫主义转向所谓本能的浪漫主义。我说过，如果一种态度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变得显著或主流，它的元素一定永远潜藏在人类的或某些人类的心灵之中。在个体的案例中我们把这叫做各种各样的性情。比如，清教徒可能存在于各种时间和地点；但是当大量的清教徒出现在同一个时间和地点，我们就得到一个清教徒时代。同样道理有了英雄时代和奢华时代、古典主义时代、理性主义时代、文艺复兴时代、颓废时代等等，以及浪漫主义时代。与其说它们每一种都代表了不同的类型，不如说它们构成了人类性格的结合体，只不过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它们被压抑、被推崇或是得到培养。为什么人们对各种态度有那样的取舍，这是事后人文历史学家要去解释的问题，但是浪漫主义这种态度确实被选择了，这才是我们能在这里谈论浪漫主义时代的原因。

辨别人类天性中永恒的元素和这些元素在历史上阶段性张扬之间的区别，是保证我们更加准确和经久地使用“浪漫”这个词的第一件武器。这样举个例子，当我们听到威廉·詹姆斯被叫做“一个浪漫主义者”时，我们就可以说：“詹姆斯和拜伦又不是一代人，你凭什么把他们两个划在一个头衔下？”然后，很有可能得到的答案是：“我叫他浪漫主

义者是因为他反理性的思想。”这样一来，关于描述的准确性的争论就开始了，还有根据整个性情或哲学体系随机的表现所得出的见解和看法是否恰当的议题。图书馆里充满了通常在战时写成的书，表现了从卢瑟到希特勒 或从费希特到墨索里尼 或是从卢梭到斯大林“一种不断升级的企图在发展”。这种实证建立的基础是把所有“信仰意志”或“信仰英雄崇拜”或“信仰人民的神圣权利”的思想家串成一条发展的线索。在这些著作中，人类思想的意图被抹杀，因为他们只想找到一套替罪羊的收集品。

思想的历史不能这样写，就像一张标准化货物的发票。这个学科需要无穷的技巧。一方面，为了使内容易懂必须按明晰的模式减少多样性；另一方面，每种思想的意思要保持不被篡改，就要不断了解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说一些人是所谓“一个立场坚定的信徒”没有任何意义——为了什么，为了谁而坚定？用什么方法？反对谁？

反理性主义也是一样，它只是所谓浪漫主义气质的各种表征中的一个。假设浪漫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之间确实有关系，这种关系指向什么方向 而且 从根上说起“反理性”是什么意思 听到批评家把对反理性主义的愤怒泼向思路如此清晰的人 如詹姆斯、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人们会猜测这些人批判理智，行为疯癫。有人甚至会猜想他们的著述一定不合语法，混乱不堪。然而事实上，人们找到的是思想的惊人凝练和集中，提出和表达异议的高超技巧，以及对秩序和形式的强烈热爱。

事实上，这四个被看做是新浪漫主义源头的现代人，和他们一百年前的先辈相同的是，他们都不是依靠一本书或一个观点名世的人。因此任何对他们思想的贬低或是对其断章取义的奉承都不可避免地与现实相矛盾。任何只要在这个问题上稍微掌握了一点第一手材料的人都会做出这样注定机敏的解释和最完美的反驳。

这里我可能要教条地列出我接下来将要证明的问题，那就是浪漫主义不等同于反理性主义，也不等同于伤感主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乌托邦理想、爱、恨、好逸恶劳或脆弱的心灵。接下来 如果这些人类特

性中的某一些激起了什么人的不满，他必须用它们各自正确的名称来称呼它们 而不是为了逃避判断把它们统称为“浪漫主义”。

如果有人不相信以上这些特性已经成为浪漫主义的鉴别标志，他只要看看第十章举出的应用实例，或者随便翻翻成打的通俗传记，找一下所谓“浪漫主义形象”。为了消遣和学习，人们会看到 L. 史戴宾和 R. 史戴宾 (L. and R. Stebbins ) 尽心写作的浪漫主义作曲家卡尔·玛利亚·冯·韦伯 (Carl Maria von Weber) 的传记。这是这方面最出色的、最具学者风范的、最机智的书；但是它处理一个浪漫主义时代人物的方法，表明它彻底背叛了那场运动的主导思想。在书的封面上我们发现对书中内容不假思索的回声“韦伯不是一个浪漫主义作曲家，他是一个严肃的工作勤奋的音乐家”。换句话说，一个浪漫主义作曲家是不干活的，那样浪漫派的音乐能够产生可真是一个奇迹。

翻开这本书，你会看到同样令人困惑的概括，比如提到一位明显是精神失常的德国公爵时，它说：“他……不是精神病就是早期德国浪漫主义某种程度的化身——这个事实上和精神病也差不多。”在这里浪漫主义成了精神病 然而在第二句里 放肆的谴责有所减轻：“当然，他在两方面都能成为这个学派的例证：厌恶努力，在行为上不加克制地遵从潜意识的召唤。”换言之，这个高贵的公爵是个浪荡子和游手好闲之徒，就和浪漫主义时代之前和之后的成千上万人一样。在他身上究竟有什么是特别浪漫主义的呢？我们无从而知。而且更早的定义似乎把这场运动描述得完全不同。“有这样一个时期”我们看到 当“一个人会非常庄严地说‘生活就是如此；但是我不希望它如此。我在无法忍受的现实之上创造。’这就是浪漫主义的精髓所在”。

因为对这个精髓感到不满意，传记作家们在他们浪漫主义课题的可能的“动机”里另辟蹊径。例如 韦伯“之所以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是因为他自己深信如此，还是因为他被他那没有远见的父亲牵着鼻子走，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而在母亲那些天主教会的故事中长大？”对这样的问题没有合理的答案 另外还有一个 同样似是而非：“谢林的浪漫主义化教育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是不是另外一种哲学思想会造就一个古

典主义的而不是浪漫主义的作曲家呢？”这种说法后面有一笔更深的糊涂账：谢林和韦伯都有各自的哲学思考，然而“公开书写或谈论自由是不可能的……对那些永恒问题的思考被拖延至一个更为自由的时代，浪漫主义只提供了日常的逃避”。我可以顺便提一下，谢林正是一位因写作了关于人类自由的著作而闻名的作家。

以下是对浪漫主义及其感情的若干点评：“他们的友谊具有浪漫主义特征并且至死不渝……”“他多次恋爱，[但是]并不像他那些浪漫主义者朋友那样无病呻吟……”作为结论，对一个在各方面都承认自己是浪漫派附庸的人，书中做出一些评价：“德国的浪漫主义者反对劳作，但是从来没有人比韦伯工作更勤奋；德国的浪漫主义者内向而主观，但是韦伯却热爱社会，并且用客观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创作。”最后：“谁也不能轻易地忽视这两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者的评价，梅耶贝尔（Meyerbeer）和韦伯（Weber）。”

把这些句子并置在一起，无疑有一种滑稽的效果。虽然这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想羞辱这本传记。如果这本书仅仅是一个熟练工的作品，作者对待浪漫主义的方法可能不那么重要。但是他们的观点是受过教育的观点，挑出这些句子的关键原因是它们忠实地反映了普遍的观点。一千个读者里恐怕也不会有一个会在那些有趣而考据翔实的篇章中特别注意到这些句子。这些声明仿佛只是陈述了公认的事实；这只能说明它们的自相矛盾和固有的谬误已经被重复得太多，以至我们已经注意不到它们有什么问题。

根据这些所谓受过教育的观点，浪漫主义是疯癫、逃避、内向、无病呻吟和懒惰，但是所刻画的浪漫主义者却是客观、勤奋、对友谊坚定、永恒作品的创造者，一个其评价不能被轻易忽视的人。我还略过了他浅薄的心理，来自于无能的父亲，罗马天主教的母亲，或是德国哲学家谢林——作为一个浪漫主义音乐家作品中的决定性因素。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观点可以像帽子和手套一样随时换来换去。这只是一部分，我们更多可以看到的是，浪漫主义者是一种和别人完全不同的生物，和我们在书中了解和看到的人完全不同。正因为如此，当传记作家

发现他的浪漫主义主人公行为理智，工作勤奋，表现出长久的感情，在他的艺术中表现出判断和正直时，他感到十分惊讶。

### 3

对一书中散见的错误进行列举，并非与我要做的对内在的浪漫主义的界定没有关系。这就像在解释历史上的浪漫主义时，显示反对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高潮为浪漫主义带来的困难是十分重要的一样，在解释内在的浪漫主义时，也要显示出要想赶上现在普及的认识，反理性、无病呻吟之类是多么不可能。我还要进一步指出，现在已有的所有学术性界定，无论是否表示同情，都无法令人满意。浪漫主义不是中世纪的回归，不是对异国情调的喜爱，不是对理性的反叛，不是对个人主义的夸大，不是潜意识的解放，不是对科学方法的反对，不是泛神论的复苏，不是理想主义和天主教教义，不是对艺术传统的抛弃，不是对情感的偏爱，不是回归自然的运动，不是对武力的歌颂。它不是考试的标准答案中所提供的一大堆总体特征中的任何一种。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任何一种特征都不可能套用在每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者身上。提到任何一种特质，擅长驳斥的批评家都会指出一个不具备这种特质的浪漫主义者；他甚至还能举出完全背道而驰的例子。正是这个真理使得很多批评家放弃了研究——转而疯狂污蔑浪漫主义以掩盖初涉其中就被其神秘击败的窘迫。

这并不是说，教科书中列举的那些倾向在浪漫主义时代不存在。它们显而易见是存在的，并且学者们可以在浪漫主义作品中找到。但是仅仅特征的累计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除非它对于几乎所有涉及的个体都成立。错误在于，人们认为时代由共同观点和共同特点构成。如果是这样，那么每个时代都有的不同观点的论争又怎么解释？如果是这样，约翰·杜威 (John Dewey) 和 T. S. 艾略特怎么会属于同一个文化背景？如果是这样，任何传统怎么还能代代相传？如果是这样，情况应该与现实相反，一批互相一致的人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控制局

面，然后另外一批情况与之相反但也是互相一致的人再控制一个世纪。

换言之，我们想要的内在的浪漫主义的定义正是带来——并顺便解释了——我所列举的种种看法的根源。为什么一些浪漫主义者攻击理性？为什么有一些浪漫主义者退守天主教义？为什么有一些浪漫主义者主张自由，而另外一些却相反？为什么一些浪漫主义者歌颂中世纪而另外一些却钟情古希腊？很明显，把人们聚合在一个时代的并不是他们各自的哲学思想，而是这些哲学思想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浪漫主义时代，这个主要问题是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已经扫荡了一切。甚至在大革命之前，也许可以看做内部衰朽的外部体现，就已经不可能像旧的形式还有生命力那样去思考、表演、写作和绘画。18世纪苛刻的哲学家们已经自毁长城，下面的一代必须建造或埋葬。据此我们得出结论，浪漫主义者是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先驱；浪漫主义时代可以称为解决的时代，与消融的18世纪相对立。

众多的人都看到了重建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计划着同样的解决办法，或是对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都有同样的看法。分歧来自于不同的性情、地理位置和特别的兴趣。一个像华兹华斯或雨果那样的诗人看到的是18世纪措辞的空洞以及创造新的诗歌语言的必要；一个像叔本华那样的哲学家看到的是18世纪一味追求发展的虚妄和重建道德现实的必要，并且提出更好地忍受它的一些建议；一个像伯克那样的政治理论家，理解了社会制度的大规模崩溃后，必须提出可供选择的变革之方；一个像黑格尔那样的思想家，曾经是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美学家，把创造着做是历史和思想上冲突的结果，至少要去找到一套解释变革性质的新逻辑，然后他又说明了如何使用这套逻辑来重建一个更为牢靠的地基。

显然这些人不能被划入浪漫派，但是他们都平等地分享了浪漫主义的趋向。不仅如此，他们还共同拥有一些显著的偏好，例如对活力的崇拜，道德的狂热和独创的天才。因为这是一个从各个角度面对同一主要问题的时代，所以一些人类的特性比以往受到了更高的评价。重

建的任务明显需要活力、道德和天才，所以他们这种新的激情在浪漫主义时代就不是古怪或无用的特性，而是他们所处位置的需要。

同样的逻辑，人们会明白浪漫主义根本不是什么灵魂脆弱、无法承受现实生活的人对现实的一种逃避。真相是，这些灵魂想要改变现实生活中他们不喜欢的那一部分，如果这部分现实不打算投降的话，至少要把他们的理想记录下来——这两者都是重建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步骤。我们现在对“逃避”这个词的使用受到了装腔作势和双重含义的损害，而且如果一个人不去首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就应该拒绝就这个词的应用与他进行争论：“假设一个原始人遇上大雨，于是第一次产生了进山洞避雨的念头。你说他这是面对现实还是逃避现实呢？”这个例子包裹了文明的整个历史，将创造区别于逃避的通用的测试方法也可以从这个例子中推演出来。仅仅是一个人寻找山洞或宣布建造一个小屋的事实是不够的；然后他会做什么呢？这一次独立的行为与他一生的轨迹有什么关系呢？将这个测试用于浪漫主义，我们就会发现，总体来说它的建设性远远超过逃避现实。

然而，有人也许会说，其他面对创造任务的年代并没有产生类似浪漫主义的文化。浪漫主义之前，也就是随 18 世纪结束的文化体系诞生于 1650 年，它采取的就是我们称之为古典主义的形式。确实如此。所以要理解浪漫主义，我们必须在它的创造性任务的事实上加上它用特定的方法来构思它的任务这个事实。它在关于人的巨大矛盾的认识中来构思它的任务。我指的是人类的伟大与人类的可怜之间的矛盾，人类的力量和人类的不幸之间的矛盾。

一个接一个地引用浪漫主义者们提到和评论到这个矛盾的文字，实在是一个乏味的工作。但是在浪漫主义的作品中，人们不能不被对这个独立的“发现”的不断重复所打动。它凸现于各种形式和文本里，不管作者是否在寻找这一代人多面行为中的共同因素。不仅如此，在这个时期之外还有一些值得记住的证据。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对人类天性中的矛盾最著名的表达呢？当然是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他在历史上不算浪漫主义，而是一个 17 世纪的作家，他的整个趋向 社会和宗教

上的，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一个异端。是谁在 18 世纪遭到古典主义者伏尔泰（Voltaire）最为持久地攻击？就是帕斯卡尔。伏尔泰写了一本《反对帕斯卡尔》并且把他看做是启蒙运动最大的敌人。本着同样的精神 孔多塞（Condorcet）炮制了一本《思想录》的改造版。帕斯卡尔的成就何时才完全浮出水面，并且显示出全部意义？——直到 1843 年，浪漫主义的 19 世纪上半叶。

冲突的核心是关于人类命运的观点——伟大与不幸的对立——这引导帕斯卡尔把艺术和社会分析为仅仅是常规的和相对的；他指出，河流此岸的公正就是彼岸的不公正。简言之，人类首先是在宇宙里迷失的生物，他制造了他的庇护，心理、社会和知识分子。这也是后来浪漫主义者的观点，他们发现自己在旧政权的残余下处境不公，没有来自天外的保护，只有被迫建立新的秩序。

但是对一根思想着的芦苇——帕斯卡尔这样形容人——来说 握有力量和感到软弱之间的矛盾状况不能被麻木地忍受。即使当保护性的社会秩序正在建立，也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事实上，很多人感到不完善的社会制度不足以解决内在冲突。因而有了对一种哲学、一种宗教、一种信念的寻找，以超越和统一已经感觉到的不和谐。帕斯卡尔自己，据我们所知，就在基督教苦行中找到了这种信念。浪漫主义者晚于帕斯卡尔一百五十多年，在各种信仰对象中找到了自己的信念——泛神论 天主教 社会主义 宿命论 艺术 科学 民族状况。要填满这张表就要列出浪漫主义成就的清单。这里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信念植根于地下的内在联系在于一个双重问题，即创造一个新世界，但要在创造的同时知道人既有创造性又有局限性，既是施者也是受者，精神上是无穷的，行动上却是有限的。

如果我们现在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浪漫主义是死是生？我们能够做出一些假设性的答案，这些答案可能引导我们在最后做出“生”或“死”的决定。根据这里提出的区分的见解，内在的浪漫主义，对于特定的个体来说，现在还一如既往地活着，因为这是人类的一个常数。但是如果试图说目前的时代仍然是，或又回到浪漫主义，我们就必须确

定目前的时代是我刚才描述过的人类的观点之下的一个产物。如果现代主义被认为是古典的，我们必须证明它在何种意义上推翻了它的前辈。如果我们目前的文化是第三种类型，那它和另外两种之间的关系必须明确。在我们更多地了解一个半世纪前历史上的浪漫主义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 II 卢梭和现代专制

### 1

我们现在的观点很显然不能囊括我们称之为‘浪漫主义’的各种事实，而且从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些孤立的作品中找到一个共同的分母也毫无用处。因而有了重新制造浪漫主义者们自我发现时的那种环境氛围的需要——这种氛围就是在旧制度和传统崩溃之后必须造就一套新的——同时，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重拾他们认为人类是伟大和不幸的共体的观点。

我知道“创造新世界”这个表达看上去有一种似是而非的嫌疑容易招来反驳。我能想像欧文·白璧德晚期的信徒看到它会露出挑剔的微笑，想到浪漫主义和社会秩序的创造之间会有些什么关系。他会说：“卢梭是浪漫主义之父：这一点没人反对。同时卢梭也是无政府主义之父，已有社会价值观的破坏者，文明的蔑视者，推行个人主义的鼓吹者声称‘回到自然’的人他幻想出‘高贵的奴隶’希望我们回到奴隶制度。不仅如此。”这个“反卢梭者”会加上“卢梭在历史上早于法国大革命。他在革命爆发前十一年就死了，因此不可能感受到五十年后，也就是拿破仑战争后人们所陷入的焦虑。除了因他处于多愁善感的年纪而得到的谅解外，卢梭的作品完全是破坏性的。”

这确实就是对卢梭批评的共同见解，对他们惟一要说的，除了提